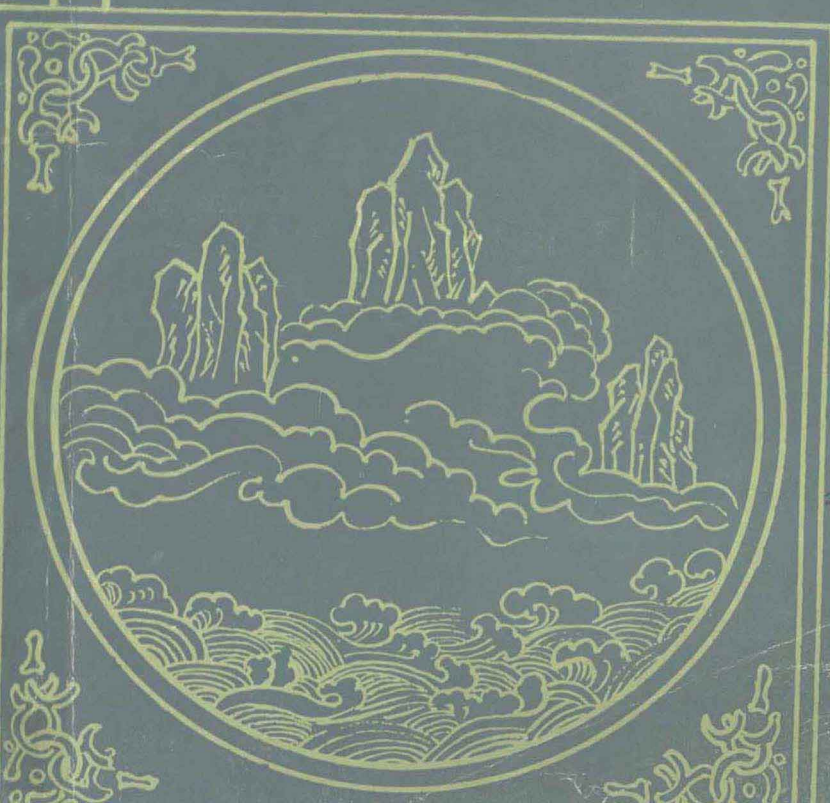


文史集林



人文杂志丛刊
第四期

文 史 集 林

第 一 辑

史念海主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前言·····史念海 (1)

《水经》中的河源·····顾颉刚遗作 (4)

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

—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

·····白寿彝 (9)

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

的教育问题·····白寿彝 (24)

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王毓瑚 (34)

“楚灭越在怀王二十三年”

说评议·····蒋天枢 (46)

《宋史·张浚传》质疑·····杨德泉 (53)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

—读吴敏树《栟湖文集》中的经济史料

·····傅衣凌 (63)

由春秋战国到秦汉大量流通的黄

金究竟是金还是铜?傅筑夫 (74)

《明修江苏方志考》简述

——兼谈《中国古方志考》的体例马里千 (100)

关于《之》、《哈》两韵中国上古

音值问题杨向奎 (121)

《山海经》拾证孙培良 (137)

高岑异同论卞孝萱、乔长阜、黄志洪 (151)

《长恨歌》新解黄永年 (179)

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史念海 (207)

平阳、雍都地望确定与秦先公

徒都迹略卢连成 (270)

西汉关中的人口迁移葛剑雄 (282)

吐谷浑国地理考释李德贤 (320)

关于元代刘斌兴建灞桥的重要历史文献李之勤 (335)

《水经注》中长安附近的川原风貌曹尔琴 (351)

封面设计芦兆祥

本辑责任编辑: 张玉良

前

言

史念海

《文史集林》出版问世了。

为什么要编辑《文史集林》？当然是为了多开辟一个供文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发表成果的新园地，从而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同时，为了保证这个繁荣是健康的而不是虚假的，也就是说能够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至物质文明真正起点积极作用，还希望通过《文史集林》和文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共同树立一个良好的学风。

怎样树立良好的学风？是不是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也就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说的，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引出“正确的结论”，对学术研究来说，就是找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依据丰富的材料，

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就能够找到规律，取得一定的成就，自然就会有相应的贡献，因而都应该受到欢迎。有些同志在材料上用工夫，即通常所谓考证工作，也应该欢迎，因为这给找寻规律提供了可以信据的材料。为了材料能够真实，立论能够有正确的依据，考证工作是少不了的。但考证只是一种治学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决不能以考证为满足，而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就。至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结构史观、人口史观、环境史观等唯心货色，当然，要进行分析 and 批判。

(二) 要理论联系实际。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讲不应该不顾实际，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语照抄照搬，甚至从理论到理论，玩概念游戏。因为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身也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自然更谈不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再是讲所研究的理论或考证的东西要有用，要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至物质文明起积极作用。其中有些是直接的，如研究优秀的文化遗产、优秀的历史人物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直接起作用，研究历史上的气候、雨量、森林、自然灾害等对经济建设也可以直接起作用。同时还有许多研究成果所起的积极作用是间接的。但总要有用，否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还应该提到：一切学术研究都应该以具体材料作依据。文献记载自然是主要依据材料。文献记载有正确的，也难免有不正确的，必须进一步和实际情况相参照，才能够辨别出它的正确与否。远在两千年前，司马迁撰著《史记》时，于取材文献材料之外，还亲自到各处考察，和实际情况相参照，所以《史记》一书博大精深，成为后世的楷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事实的联系，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当然，这种联系实际也不能牵强附会，不能把封建社会的人物和今天的人物作简单的类比或者用今天的思想行动去化装古人。

(三) 贯彻“双百”方针。譬如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经济,研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经济斗争,也要研究文化,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又如研究古典文学,不仅要研究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以及《文心雕龙》、《红楼梦》,还要多辟新径,不落陈套,其他为数众多的作家、作品也应该研究。这就叫学术研究上的“百花齐放”,放就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东西,不说空言,不因袭前人的旧说。大家都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东西,各出己见,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就需要“百家争鸣”,在学术上通过争辩,使真理愈辩愈明。当然这种争辩应该是同志式的,有礼貌的,不能乱扣帽子,不能以势压人。但也不能由于怕伤感情而不辩不争,即使师生之间,好朋友之间,也可以争辩,应该通过争辩更加深学术上的友谊和感情。

如上所谈是不是对?如果不对,请文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和读者提出批评。如果对,要真正实行,也要依靠文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提供高质量的文章,使《文史集林》这块新开辟的园地开出鲜丽的花朵,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至物质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水经》中的河源

顾颉刚

《水经》承接着《禹贡》，作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把《禹贡》的《导水》一章扩大为专书，这是中国学术界中最可纪念的伟绩。

这部书是谁所著，开头没有人能说，直到《唐六典》始说为西汉末桑钦作。桑钦是传《古文尚书》的专家，《汉书·地理志》里采录了他很多考释水道的文字，当然有此可能。但唐杜佑在《通典》里指出许多地名不是桑钦时所有，在他指出的证据中有一个最迟出的地名是永安，这是河东郡的县，本名彘，到东汉的顺帝才改名的，可见此书该出于顺帝之后。后来讨论日密，到清代，胡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等找出了曹魏时的地名，因此断为东汉后陆续增益，或直断全文为三国魏人所作。近人锺凤年作《水经著作时代之研究》，详为分析，寻出许多西汉专有的地名，以为《汉书·沟洫志》称“王莽时徵能治河者以百数，……但崇空语，无施行者”，经文当即由此百余治河专家徵至首都，各出所知，合纂而成。因为本非出自一人，故不得其主名。其著作的时间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一一）河决魏郡以后。从东汉到三国，递有修改，遂大失其本来面目（《齐鲁学报》第一期）。这个结论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治河专家虽是想做一部科学性的《水经》，可是那个时

代的工作条件还不够，他们不容易得着远方的正确材料，所以书中所讲的河源竟是非常的迷离恍惚，十分反科学。

《水经》是酈道元注的，《经》和《注》向来混淆不清。自明朝的朱谋玮起，细心分析，经过清代学者的继续工作，才可作大体的决定。王先谦本最后出，现在就根据了他所定的经文抄在下面：

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

河水出其东北隅，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其一流出于阾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

经文先说昆仑在嵩山西北五万里外，河水从那里出来，进了渤海；再从渤海里出来，流经积石山的石门，又南到葱岭。这可见昆仑和积石都在葱岭的北面。葱岭的北面，现在是中央亚细亚，要从那边寻出一个渤海来，该是巴尔喀什湖（L. Balkhash）吧？昆仑更在渤海的东北，该是分画欧、亚两洲的高加索山（mt. Caucasias）吧？他再说葱岭、于阾两河东注蒲昌海之后，东入中国的敦煌、酒泉、张掖三郡的南面，于是再到陇西的河关县北，天呀，在河西走廊里怎能寻出这样一条从西到东的大川？而且三郡之南即是祁连山，难道河水能在这高山上自由的流行？汉河关县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即指今青海的贵德、循化两县的黄河，又不知张掖的河水如何跳过了祁连山而至河关？

昆仑、积石在葱岭之北，以前没有人讲过。河水从蒲昌海东入塞，直到张掖，以前也没人讲过。河关县的河水上承张掖之流，以前更没人讲过。《水经》这说法，真可称为旋乾转坤、石破天惊的大手笔，直使我们咋舌不止！

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实际的世界而另外创造出这一个？那时没

有正确的地图可以依据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是作者想汇合许多不同系统的记载，而整齐拍合，使得它不矛盾；却不料结果自己却陷于更矛盾的结局。

现在，我试寻这一段文字的根源来：

《禹本纪》说：“昆仑……去嵩高五万里，天地之中也。”

（郭注《海内西经》及郦《注》引）所以它也说：“昆仑墟……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淮南·地形》说：“昆仑墟……其高万一千里。”所以它也说：“其高万一千里。”

《海内西经》说：“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西次三经》说：“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所以它也说：“河水出其东北隅，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在这里，作者修改了一点。就是《海内西经》的河水是西南入渤海，又西北入积石的，这位作者以为昆仑在中，中国在东，如果照《海内西经》的说法，则北去更远，无法与葱岭相接，所以他改为东南入渤海，南至积石。

《汉书·西域传》说：“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所以它也说：“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其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这样一比较，就知道他所以敢说“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即因《西域传》有“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之文，玉门、阳关之内就是这三郡，因此他竟大胆地写下去了。哪知《西域传》此语乃是说蒲昌海与玉门、阳关的距离的，并不是指河水经历的路线！这样看来，这段文字的写出自在班固之后，作者读得《汉书》，以至有此误读的错谬；其为东汉至三国时人的修改，又有何疑！

这段文字所取资的材料，以上都快摘出来了。它字字有来历，然而作者不辨神话与历史的分野，一起拼凑上去，造成了极大的讹误。实在说来，就是拼凑的工作，这位作者也何尝干好。《汉书·西域传》明说“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可见积石是中国的山，在蒲昌海之南。现在他把积石扔远了，南出于积石的是葱岭河了，等到河水流进陇西河关时就再不见有积石了！这是说得过去的吗？

错误到如此地步，郦道元作注也没法替它圆谎，所以说：

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迺积石而为中国河。……而经文在此，似如不比。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杜佑也不客气地说：

夫山川地形固有定体。自葱岭、于阗之东，敦煌、酒泉、张掖之间，华人来往非少，从后汉至大唐，图籍相承，注记不绝。大碛距数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变，陵迁谷移之谈，此处岂有河流！纂集者不详斯甚。（《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

这些话都很对，它的错误已指出来了。只有清朝人爱惜古书，还想在无可奈何中替它回护。胡渭《禹贡锥指》道：

案《水经》叙西域两源，较《汉书》尤为明备。惟是积石一山，错简在渤海之下，葱岭之上，遂来后人之弹射，并其全经而疑之。而不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窜易也。……汉世河关以西皆为羌中地，河水所经人莫能睹，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谓河自盐泽入玉门阳关也。

其实古人的时代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想取得正确的知识非常困难，他们的错是可以原谅的。何必说古人无所不知，知无不合，而把实在不合的地方归罪于“错简”。我们现在只从它的材料根源和作者的拼接方法看来，已可断定这是无可辩驳的错误了！

再有死心眼儿包庇《水经》此文，不以为有错的，是郝懿行

的《山海经笺疏》。他说：

（河水……入禹所导积石山），案《括地志》所谓小积石也。

……据《水经》说，积石山在蒲昌海之上，盖大积石也。此及《海外北经》所说，皆小积石也。酈氏不知，误以大积石为即小积石，

故滥引此经之文，又议《水经》为非，其谬甚矣！（《海内西经》）

河关县的积石为小积石，这本是唐人之说。但大积石一名，唐人派在河关西南的大雪山，酈氏却改派到葱岭的北面去了。只为回护古人，不惜杜造故实，反骂酈道元为“其谬甚矣”，其实这个“谬”正是夫子自道也！而且《海内西经》言“禹所导积石山”，《海外北经》言“禹所积石之山”，积石之上皆冠以禹，何等郑重，倘使禹亲自积石所成的山还说是“小”，该谁所堆积的才合称“大”呢？

然则《水经》此文没有一点好处吗？那也不然。自从张骞以来河水潜行地下的说法给这位作者推翻了。他只认有显流，不认有伏流，这也算是一回革命！

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

——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

白寿彝

同志们，这次到贵校来，是来请教来了，请教多卷本《中国通史》的隋唐卷怎么编。史念海同志同学校的几位领导给我一个机会，使我就自己平常感觉到的一些问题的想法跟同志们谈谈，请大家指教。我所谈的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可以说的问题不少，我想谈六个问题。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这六个问题，有的已在别处讲过，有的也写了一点小文章，但都还是很粗浅的意见。咱们都是同行，把这些粗浅的意见跟同行们谈谈，不知对不对。

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

对历史资料如何看？过去我们传统的看法，就是把记载过去历史的资料，都叫历史资料。同时，又简单地认为，这种历史资料在除去记载历史的过去之外，再没有旁的內容了。这样的看法比较普遍。一九七二年，左倾思潮很得势的时候，我们标点二十

四史，每部前边要写个出版说明。写的时候，心里很嘀咕：搞这个封建的东西，不挨批呀！因此在出版说明里，一开头总是讲，这部历史书是唯心主义观点的，是英雄史观的，很错误，甚至说是很反动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标点，还要出版呢？毛泽东同志批示要搞这个工作，为什么呢？于是，笔锋一转，说，因为它是一部历史资料，做为资料用，它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把历史资料看得很单纯。当时，有的同志提到，这里面不仅有历史资料，还有思想资料，但这个意见不容易被接受。有的同志就认为，思想资料就是思想史的资料。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思想资料 and 思想史资料有联系，但不是一码事。把历史资料简单地理解为记载过去的历史事情，我看是不对的，是很片面的。

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得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研究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解释现在是为了观察未来。历史的过程，不能一刀割断。我们要看历史资料，不光是为了了解过去，而且为的是了解现在。对于现在如果有了相当深的了解，这也就帮助我们去了解过去。我看这个意思很要紧。这个意思如果对了，那我们就不会把历史资料看作是死的东西，而是活的东西，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大部分历史资料是有生命力的，现在还有生命力。如果这样理解，历史资料的意义就同过去理解的大不一样了。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当前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刚才我们讲，思想资料与思想史资料有联系，但不一样，不能等同起来。过去中国思想的发展，包含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等，从各种思想的发展过程看，这些思想是怎么样发展变化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这是思想史的资料。但同时，

这些资料里面提出好多问题，关于各种思想的好多问题，关于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有的是荒唐的，有的是过去人已解决了一些的，有的提出来还没有解决，在今天仍须解决的。这些问题，过去人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解决多少，没有解决多少，或是根本不值一提了，或是应该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看，这是思想资料，而不是思想史资料。在事实上，这两种性质往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从研究角度看来，这两种性质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性。如果我们这样认识问题，就能比较好、比较活地看待历史资料。文学的资料、艺术的资料也是如此。它们是历史的资料，同时又是文学、艺术的资料。更容易懂的，是在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的方面。我们前人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其中有些东西已成过去的陈迹，今天用不上了，有的还很有用处。比方中国的医药学，历代医书很多，里面记载各种疾病，各种医疗方法，各种药方，在今天实际上还被大量地使用，并且使用起来，还有疗效。这些医书我们怎么看呢？把它们看成是单纯历史资料吗？我们不当这样看。我们应当承认其中还有大量现实的医学资料、医药资料。农书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农业生产不断要有变化，比较多的变化，但是农书中所记载的好多种生产技术，今天还是在使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其中有些东西，很有经验的老农未必就能总结那么多。这些农书中的资料，不止是农学史的资料，还是农学资料，这是很清楚的。

我这样的理解是很粗浅的。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还不久。我们过去那种把历史资料看成是死东西的思想，要有所改变。要看到历史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还是富有生命力、还能够加以利用，还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发展。我们学历史首先遇到的是资料问题。把历史资料的作用看得宽一点、深一点，对历史资料本身也增加活力，容易跟现实结合，容易跟现在联系，不至于把它

看成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毫无联系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很长，这是大家知道的。中国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基本上是连年不断地记载，量也很大。这在世界各国是少见的，这我们也都知道。这讲的是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记载、中国历史的著作。但对于中国历史学，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我们的历史学，也有很长久的历史，也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有相当多的同行不注意这个问题，这在历史学界是个怪现象。我们知道，研究哲学的总是从哲学史开头，研究文学的要学文学史，各种科学都有它们各自专门的历史。搞历史的不搞自己的史学史，看不见中国的历史学的长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

曾经有这样的情况，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没有历史学。要有，也是唯心的观点，全是荒谬的。这是一种看法。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目录学就是史学，讲历史学的历史，可以拿目录学的历史去代替。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很有特点，很值得我们研究。研究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就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对于我们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很有帮助。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胡耀邦同志讲，我们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

里面就应该包含史学方面的问题。前些天周扬同志发表一篇文章，怀念徐悲鸿先生，说徐悲鸿的作品具有造型艺术的民族特点，说他是把中国的民族传统跟西洋的东西结合起来了，自成一家。这话对于我们很有启发。中国史学也应该如此。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不是照抄的，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现成的词句搬来就成。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历史的问题、解决中国历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工作。

关于中国史学遗产，我看有好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历代的思想家，有不少的人都有他们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他们讲到社会发展、社会思想的时候，讲到政治思想的时候，离不开史学思想。过去我们讲史学思想，很简单地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如果要讲史学思想，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行了。这个话有道理，但不完全对，至少不全面。马克思主义没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过去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不可能都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面，但是它们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对于这些前人所做的成果，我们不要一脚踢开，应该吸收过来做我们的营养。这样做，可以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比方说司马迁讲秦始皇，肯定了秦始皇统一的功绩，认为在历史上很起作用，同时对他的暴虐，对人民的虐政，进行了谴责。如果我们提高了说，司马迁也是有两点论，他对历史人物，对秦始皇的这个评价，还是对的。过去历史家讲历史，总是要讲人心向背的问题。人心向背同我们讲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有区别，不是一个意思，但是这里面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也还有某种作用。这个思想，我看还是对的。过去历史家评论一个政权，评论一种政策的得失，总是要看它得